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3.013

“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内容结构和总体特征研究

■ 韩丽颖 崔力炎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研究发现,“00后”大学生的数字化发展主要包含“数字化身份认同”“交往趋向”“网络群组”“边界意识”“网络适应”“技术依赖”六个方面,以及自我身份认同、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机器三重结构。在数字化自我身份认同、数字化人际交往、数字化人机互动方面,“00后”大学生发展分别呈现出“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流动整合”“交往方式变化与社交圈层延展”“对数字技术的适应和依赖”等特征。建议进一步注重引导“00后”大学生合理整合线上线下多重身份,加强数字交往与现实交往的相互促进,推动“00后”大学生健康发展。

【关键词】青年发展 数字化发展 “自我同一性”

一、问题提出

大学生发展研究是青年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主要有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大学生发展论”和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为基础的“院校影响论”两大流派^[1]。赞科夫和凯洛夫两位学者围绕学生发展分别提出了“一般发展”^[2]和“全面发展”^[3]两种理论。尽管不同学者、不同学科在立场、视角和方法上各有不同,但大多是围绕大学阶段个体生存发展的核心任务及其与外部环境(家庭、学校、社会、媒介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致力于揭示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探索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联动机制。进入21世纪,伴随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越发关注数字技术对大学生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影响,出现了有关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研究热潮。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以数字技术描摹或刻画现时代大学生的发展样态,借以探讨数字技术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例如,鉴于大学生同数字技术的密切联系,很多人将先前被称为“Z世代”“千禧后一代(Post-Millennials)”^[4]的青少年,改为“Facebook一代”或“转换一代(Zappers)”^[5],抑或是“C一代(C代表连接)”“D一代(D代表数字)”等。互联网创想中心(Imag-

收稿日期:2023-03-11

作者简介:韩丽颖,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青少年成长规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崔力炎,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与价值观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心理及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2JDSZKZ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ining the Internet Center)发布的第5次“互联网未来”调查发现,当今青少年被描述为“永远在线的一代”,亦即“AO(Always-on Generation)一代”,认为“‘永远在线一代’的年轻人(从小一直和他人、和信息保持联系)将成为灵活的、行动迅速的多面手,依靠互联网作为其外部大脑,运用不同于长辈的方式解决问题”^[6]。

“00后”大学生是伴随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恰逢信息技术变革大潮,其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设备更是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长期的互联网生存环境使他们形成了有关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体验,并逐渐成长为“半数字化”的群体。受数字技术的影响,“00后”大学生创造和体验世界、认识和处理社会关系、判断和评价价值选择的方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并显著区别于以往世代。对“00后”大学生而言,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用以获得信息的工具或手段,更是他们生存交往的主要方式,并影响着其成长过程。可见,“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集中反映数字环境中大学生个体成长和自我学习的心理过程^[7],涵盖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各种问题。当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成为大学生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可视性影响着其人际交往,大学生发展便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征。由此,探讨“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问题,既需要研究数字技术背景下大学生发展样态的新变化,也需要把握大学生成长发展中的内在诉求,进而在内外部因素的对比中,呈现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结构与特征。

一方面,“00后”大学生所处的特定年龄阶段及身心发展规律,决定了其数字化发展仍将聚焦“自我同一性”的建构。“自我同一性”是人们关于“我是谁”的认识,其核心在于通过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形成对自身发展稳定且连续的认知。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他们在生理和年龄上已达到成年水准,但是心理和经济两个维度却尚未真正实现完全独立。阿奈特将大学阶段称为“始成年期”,认为该阶段的青年不仅仅在人口统计学上与之前的青春期和之后的成年时期存在差异,更在主观上和心理上与其他阶段有所不同^[8]。该阶段是个体为正式步入社会做好最后准备的时期,“认同探索”是该阶段的首要任务^[9]。阿奈特、施瓦茨和科特在《始成年期的认同(Identity)与施为(Agency)》中进一步指出:“如果即将成年的个体要在20多岁的时候做出持久的生活承诺(例如爱情承诺、职业选择),那他们必须首先承担起心理任务,即形成稳定和可行的身份认同,从而引导和维持这些承诺。”^[10]由此可见,“自我同一性”是大学生阶段成长发展的核心任务,与青少年中期或早期相比,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认同表现出更为频繁的转换和对立,他们正处于探索和构建完整人格的关键时期。在数字时代,每个学生都成长于数字控制网络之中,并在大数据的推动下以各种数字信息形式展现多样化的自我。这一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建构,既包括线上线下自我身份的整合,也包括个体与他人关系的重组,还包括个体与技术、机器之间关系的塑造。

另一方面,“00后”大学生数字化生存样态将深刻改变其认识和处理社会关系的理念与方式,对大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在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方面,大学生面临线上线下多重自我的整合问题。数字技术创造了不同于物理世界的虚拟环境,大学生可以在数字媒体平台探索多重身份,从而使其自我认知愈发分散^[11]、饱和^[12]和流动^[13]。有学者用“支离破碎的一代人”^[14]指认数字化技术背景下“00后”大学生,即“00后”大学生长期通过微博、微信、B站和抖音等“短平快”的叙事方式了解周围世界,从而拼凑出有关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这将导致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碎片化,难以建立起有关自我和社会的连贯认知。其次,在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同方面,大学生通过数字技术以新颖的方式开展社会行动,拓展人际交往空间,从而建立起新的关系和联结。值得注意的

是,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不同,它重构了现实世界的时空概念,突破了物理时空对于人们生活的边界局限,借助数字技术人们能够以更为自由开放和无限延展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生活。有研究指出,青年在虚拟交往中可以形成完备的社会认知体系,可以自由切换身份,选择符合自我要求的交往群体,最终获得更多的归属感与安全感^[15]。虽然数字技术能够使社会边缘化群体体验其与时代的联结,但过度的依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成瘾行为的发生^[16]。再次,在个体对自我与数字技术关系的认同方面,个体与机器的互动共生是数字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个时代,大学生群体的成长发展面对的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有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个体与机器之间的适应及操控关系等。研究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是对未来求职非常重要的基本技能^[17]。在社会全域性数字化背景下,青年数字能力越强,其个体社会感知越强,从而也更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18]。

综上所述,如何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全面把握“00后”大学生发展与其数字化生存的内在关系,探寻数字化条件下大学生发展的核心价值、内容结构和总体特征,是深化拓展青少年发展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鉴于“00后”大学生将积极参与现代化强国建设,大学生生命周期与国家发展周期深度重合,既赋予大学生以重要的责任使命,也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其成长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和外部表现形态,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实践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开展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1年5月至7月,其中在2021年5月进行了访谈调查,在2021年6月至7月进行了问卷调查。访谈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12名“00后”大学生,分别进行了30-60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字转录,采用Nvivo 12 Plus质化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处理。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取样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00”后大学生样本共5552人(其中,试测阶段244人,正式施测阶段5380人),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测量。删除答题时间小于3分钟、规律性作答以及明显答题不认真的答卷,共保留有效问卷4161份,有效回收率为77.34%。

(二)样本情况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出生年份在2000年(含2000年)以后,且正在学校就读的大学生。对4161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 25.0和Amos 26.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具体样本构成包括:男生1485人(35.7%),女生2676人(64.3%);重点院校学生1730人(41.6%),普通院校学生1654人(39.8%),高职院校学生777人(18.7%);理工科专业2096人(50.4%),人文社科专业2065人(49.6%);城镇学生2182人(52.4%),农村学生1979人(47.6%)。

表1 有效被试基本信息

样本量	年龄(岁) M±SD	性别		所在院校类别			所学专业类别		生源地	
		男性	女性	重点	普通	大专	理工	人文社科	城镇	农村
1 2080	19.69±0.90	747	1333	870	823	387	1043	1037	1075	1005
2 2081	19.67±0.89	738	1343	860	831	390	1053	1028	1107	974

(三)问卷设计

为全面把握“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内容结构,研究采取了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同、对自我与数字技术关系的认同三个维度出发,结合“00后”大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及其在数字环境中的行为特征,编制了访谈提纲。访谈提纲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化身份、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社会交往、网络活动、网络社区参与五大类,共20个具体问题。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归纳和分析,确定了三维结构的合理性,并形成了问卷题目编制的素材库。

参考相关理论、国内外已有研究的相关题目和质化研究结果,编制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试测问卷V1,共包含90个题目,归属于11个一级维度,3个二级维度,分为77个单选题、7个多选题和6个人口学题目。单选题主要用于建立科学化的问卷,了解和认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特征,建构“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结构。采用李克特式量表,分为5点计分,从“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多选题主要用于深入了解“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特征。人口学题目则用于呈现样本分布的特点。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试测问卷,收取244份有效问卷。结合理论构想和质化研究资料,组织专家、辅导员和“00后”大学生对问卷题目进行逐一分析,通过修改和调整重复、有歧义和有争议的题目,最终形成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初测问卷V2,共包含90个题目,归属于11个一级维度,3个二级维度,分为74个单选题、8个多选题和6个人口学题目。单选的部分为李克特式量表,分为6点计分,从“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

为确立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结构维度,将正式施测获得的4161份问卷随机分成两半(详见上页表1),一半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旨在通过数据初步探索“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题目构成及因子数目;另一半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旨在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所获得的数据结构的合理性,并结合理论构想建立三个备择结构模型,通过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依据拟合指数进一步确立“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结构。

三、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内容结构

采用2080份样本对所有题目进行初步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针对初始问卷的74个单选题目进行项目分析。结果表明,各题选项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202至0.583之间($p < 0.01$),删除相关系数小于0.3的4个题目(第2、4、10和11题)。对保留的70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939 > 0.9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chi^2=46401.33$, $df=1326$, $p < 0.001$),表明该问卷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1和碎石图综合分析,提取最为理想的6个因子。按照6因子进行第二轮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删除因子荷载小于0.3和在多个因子上有重复荷载的题目,得到清晰的6因子结构(共52道题),累计贡献率为48.91%。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6个因子进行潜变量命名,因子1“数字化身份认同”包含3、6、12、13、14、15、16、17、18、20、22、25、26、34等14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21.12%。因子2“交往趋向”包含38、39、40、41、42、43、48、72等8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37.64%。因子3“网络群组”包含28、44、45、46、50、62等6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43.93%。因子4“边界意识”包含31、32、37、49、64等5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48.91%。因子5“网络适应”包含33、58、59、60、61、66、67、69、70、74、76等11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11.27%。因子6“技术依赖”包含51、52、53、54、55、56、57、71等8道题目,解释方差贡献率为30.18%。

表2 三个备择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模型	χ^2	df	χ^2/df	RMR	G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1	13694.97	1264	10.84	0.14	0.74	0.74	0.72	0.74	0.069
模型2	13366.65	1259	10.62	0.14	0.75	0.74	0.73	0.74	0.068
模型3	4897.52	576	8.50	0.11	0.87	0.86	0.85	0.86	0.060

根据研究的理论构想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建立三个备选模型,采用2081份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3个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第一,根据理论构想建立二阶七因素模型(模型1),共包含“数字化身份认同”“数字化人际交往”“数字化人机互动”3个二阶因子,其中“数字化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包含了“自我整合”和“自我转换”2个一阶因子,“数字化人际交往”是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同,包含了“交往趋向”

“网络群组”和“边界意识”3个一阶因子,“数字化人机互动”是个体对自我与数字技术的认同,包含了“网络适应”和“技术依赖”2个一阶因子。第二,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构建了一阶六因素模型(模型2),共包含“数字化身份认同”“交往趋向”“网络群组”“边界意识”“网络适应”和“技术依赖”6个一阶因子。第三,根据模型2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组织专家讨论和对理论构想进行深度分析,调整部分因子的构成题目和部分题目的残差相关性,删除因子荷载小于0.4的题目,形成了清晰的一阶六因子结构(模型3,共36道题目,如图1所示)。

因子1为“数字化身份认同”,反映了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即个体通过整合确认线上自我信息,以及跨线上线下的自我一致性探索,进而形成对于自我的稳定性认知。该因子包含12、13、14、15、17、22、26和34共8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我会试图在网络世界中塑造一个更理想的自我”和“我在不同的网络空间中会表现出不同版本的自我”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56和0.75之间。因子2“交往趋向”、因子3“网络群组”和因子4“边界意识”共同反映了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同,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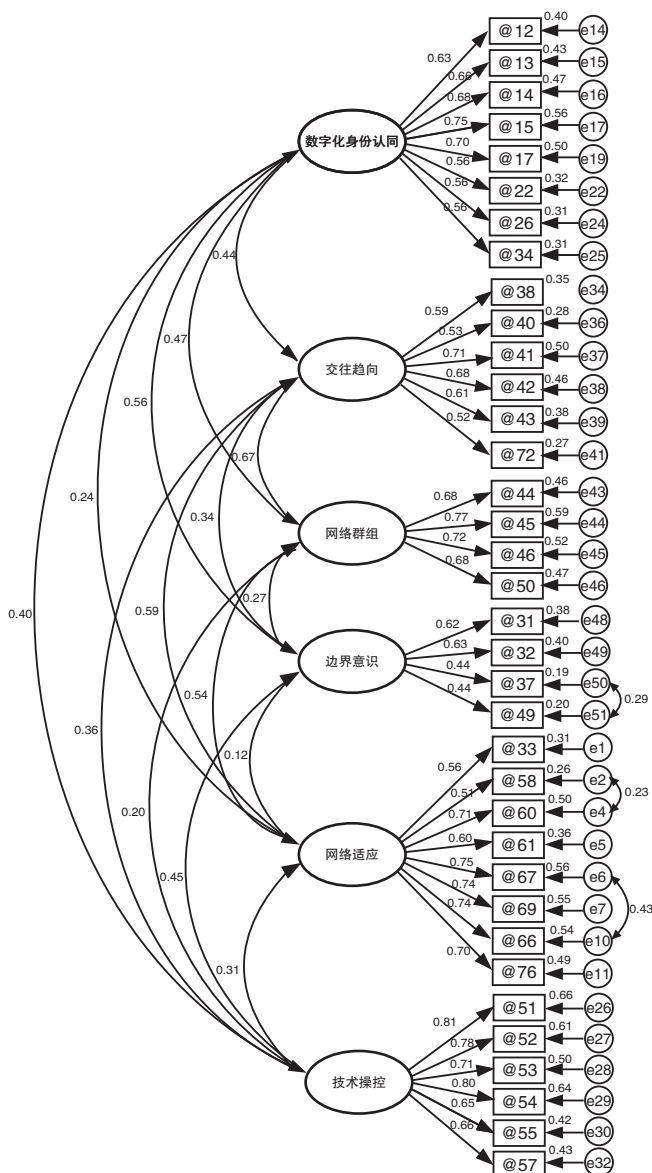


图1 模型3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以互联网中介化交往为形式的数字化人际交往特征。其中,因子2“交往趋向”是指大学生在数字空间的交往内容和主要表达方式,包含38、40、41、42、43和72共6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通过浏览别人在网上分享的积极动态(健身等),我也会增加这方面的动力和行动”和“我会精心挑选和编辑要发布的信息,以呈现自己积极美好的一面”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52和0.71之间。因子3“网络群组”是指大学生依照需求和爱好参与网络共同体的情况,包含44、45、46、50共4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我所参与的网络群组给我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和“我在所参与的网络群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68和0.77之间。因子4“边界意识”指大学生在数字空间中为了维护个人边界、控制人际距离而表现出的行为倾向,包含31、32、37、49共4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在网络上与陌生人交流时,我常常感到拘谨”和“当我在网络上与他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时,我迫切地想要摆脱这种关系”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44和0.63之间。因子5“网络适应”和因子6“技术依赖”共同反映了个体对自我与数字技术关系的认同,即在处理自我与技术媒介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数字化人机互动特征。其中,因子5“网络适应”指的是大学生在数字空间中如何识别、浏览和适应数字环境,包含33、58、60、61、66、67、69和76共8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我觉得学习、掌控一种新的电子操作系统或技术并不是什么难事”和“我能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我所需要的信息”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51和0.75之间。因子6“技术依赖”指的是大学生在数字空间中受数字环境所影响和操控的程度,包含51、52、53、54、55和57共6道题目,代表性题目有“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网络空间中”和“在网络空间中,我常常感到时间过得很快”等,各观察变量对一阶因子的荷载介于0.65和0.81之间。

至此,本研究确定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正式问卷V3,同时也明确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三维六因子结构,分别包括:反映个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数字化身份认同”因子;反映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认同的“交往趋向”“网络群组”“边界意识”3个因子;反映个体对自我与数字技术关系认同的“网络适应”和“技术依赖”2个因子,结构效度及内部一致性信度($\alpha=0.909$)均达到相关标准。

(二)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1. 数字化身份认同: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的流动整合

数字化身份是个体现实社会身份的数据化、虚拟化,是“个人在数字领域呈现、共享和形成的图像的合成”^[19]。数字空间中的身份认同既包括个体对于网络世界复杂多样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接受,也包含网络和现实自我身份的流动性转换和平衡整合。

开放的数字空间赋予人们身份表达更为复杂的多元性,即个体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境和需求任意选择用户名和形象,或者采用不同的角色和虚拟化身。这些数字身份可以因所处场域及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以往的青少年发展理论认为,大学生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单一稳定的自我意识。但是数字空间毕竟不同于物理空间,它可以允许个体创建多种多样的数字身份和人物角色,并获得拥有多个自我的能力。调查结果显示,48.71%^①的学生表示“我在不同的网络空间中会呈现不同版本的自我”;51.67%的学生表示“在网络平台中拥有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虚拟身份”;而在这些“拥有虚拟身份”的个体中,72.4%的学生表示“对于自己在网络平台中的虚拟身份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同时调查也显示,很多学生在数字空间都拥有与物理空间不同的自我表征,52.13%的学生认为“网络世界中的我与现实世界中的我,有

^① 此数据为在本题项上选择“非常像我”“比较像我”和“有点像我”3个积极选项的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的百分比总和,下同。

很大的区别”;39.94%的学生表示“我会试图在网络世界中塑造一个更理想的自我”;47.27%的学生认为“与现实世界相比,网络世界中的我,更接近真实的我”。因此,数字空间的身份具有更加浓厚的自我建构色彩,学生可以摆脱物理身份的限制塑造更符合自我期待和需求的虚拟自我。

如何实现多元身份之间的流动整合,是数字信息技术背景下个体身份建构面临的新课题。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线上与线下的身份分离及其为个体“自我同一性”建构带来的挑战,认为网络虚拟的自我可能会掩盖或消解现实真实的自我,从而导致个体对自我的唯一性和确定性产生质疑。随着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高度普及,人们已经愈发适应这种虚拟与现实的时空转换,特别是对于成长在数字环境中的“00后”大学生而言,他们往往具备更好的数字空间转换和流动能力,能够较好协调整合多个自我身份,实现线上线下的自我之间的流动转换,形成对自我的同一性评价。调查结果显示,85.89%的学生表示“离开网络空间时,我能很快适应现实世界”;62.2%的学生赞成“我在不同的网络身份之间,可以自如地转换”;78.56%的学生赞成“在网络世界中,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确信不会迷失自我”;65.97%的学生表示“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世界,我一旦形成对自己的看法,就不会轻易改变”。可见,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完全沉溺于数字身份所带来的虚拟体验,而是能够形成相对稳定、完整的自我意识。

2. 数字化人际交往:交往方式的变化与社交圈层的延展

个体发展建基于社会关系之上。传统的社会交往总是要在特定的现实场所展开,而数字化人际交往则是以数字媒体为中介,超越现实物理空间的时空局限,为不同距离和阶层的个体间交往提供了平台。这不仅拓展了陌生人之间的联结,同时也将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延伸至网络空间,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范围。

在面对面交往中,人们的自我呈现方式比较直接,而网络空间中的交流表达以文本和图像为主,且有更多时间、更多技巧进行自我形象管理。调查结果显示,71.4%的学生表示“会精心挑选和编辑发布的信息,以呈现自己积极美好的一面”。大学生群体对于网络上的人际关系反馈也非常重视,当更多的人给予和接受反馈,个体的存在感就凸显出来。69.45%的学生“希望有更多的人对我发表的QQ空间说说或朋友圈点赞”,同时69.89%的学生也“会经常为别人的QQ空间或微信朋友圈点赞”。在交往内容选择上,当前大学生的交往话题不再仅仅聚焦于理想、价值等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地转向衣食住行等生活化内容。调查结果显示,72.89%的学生表示“喜欢浏览网络空间中人们分享的美食、旅游等生活信息”;72.65%的学生表示“通过浏览他人在网上分享的积极动态(健身等),我也会增加这方面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比较可以丰富拓展大学生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但过度的社会比较也将导致心理压力或者消极的自我评价,59.58%的学生表示“通过浏览别人在网上分享的生活信息,我时常会觉得别人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除了零散的个体网络社交以外,数字空间还活跃着一些相对集中的成员共同体,这些社群组织或松散或紧密,因共同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或者现实需求而结成,且大都由一些核心“意见领袖”进行组织,若干热心成员积极参与,并逐步成为大学生新的社交圈层。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00后”大学生按照自身的需求和兴趣挑选并参与到相应的网络社群之中,47.9%的大学生“热衷于参与网络世界中的因共同兴趣、爱好而组成的群组(如二次元圈等)”,47.44%的学生“在所参与的网络群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群组社交与个体之间社交的区别在于每个网络群组都有自身高度共享的文化偏好和行为范式,这是群组成员归属感和凝聚力产生的来源,同时也对群组成员产生不同程度的规范性影响。71.62%的大学生认为“参与

的网络群组给我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65.25%的大学生认为“在网络群组中,常常有很多志趣相投的人让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由此可见,这些网络社群已经逐渐成为凝聚和影响大学生的重要载体之一,但鉴于其类型复杂、成员异质性大,要注重对其进行必要的方向引导和规范管理。

虽然数字媒体破除了人们交往的时空局限,但这种身体不在场的交流方式也导致了交往的隐匿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交风险。由此需要人们在自我呈现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数字空间的交往边界不是具体有形的,但大部分“00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边界意识和交往原则。48.93%的学生不赞成“将个人生活或情感状态记录在网络空间中”;56.77%的学生赞成“为了避免质疑或招致麻烦,我不会在网络上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59.94%的学生表示“为了避免被拿来作比较,我很少把自己的状态发布到网上”。与此同时,46%的学生表示“当我在网络上与他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时,我迫切地想要摆脱这种关系”。

3. 数字化人机互动:对数字技术的适应和依赖

对于人与技术的关系,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技术决定论,认为机器可以改变人类,技术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二是社会建构论,认为社会力量对新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具有重要影响,人类在技术面前总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强调人类才是变革的推动者,而不是机器。综合考量科技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数字技术能够加速或者放大某些文化特征并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和思维方式。

对“00后”大学生而言,数字文化基因深深镌刻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并为他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便利。调查显示,72.6%的学生认为“网络空间带给人的影响利大于弊”;76.26%的学生赞同“网络世界中的我可以拥有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86.11%的学生赞同“我在网络世界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学习经验”;76.38%的学生表示“在网络空间中,我可以独立、自由地表达自己”。大部分学生都表示能够很好地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79.81%的学生表示“可以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电脑及各种电子设备”;77.34%的学生觉得“学习、掌控一种新的电子操作系统或技术并不是难事”;75.90%的学生认为“能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我所需要的信息”;77.43%的学生认为“无论技术怎样变革和更新,我都能适应它”。可见,这一代青年成长于数字环境中,已经非常适应新技术的更新迭代,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获得感。

随着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00后”大学生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调查结果显示,89.7%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在4小时以上,其中13.4%的学生每天上网在10小时以上,网络的过度使用导致一些学生偏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产生了因网络卡顿而焦躁的消极情绪体验。49.99%的学生表示“离开手机、网络,我经常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什么”;67.27%的学生“常常因为玩手机等电子设备而睡得很晚”;64.72%的学生表示“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网络空间中”;69.24%的学生表示“网络世界会削弱我的自律能力,浪费时间”。

四、结论与建议

大学生发展是个体身心发展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作为“第三代数字原住民”及“在线一代”,“00后”大学生从出生起便沉浸于数字化环境中,将数字技术融于个体的成长生活中,并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结构。按照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

keles)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人的现代性应该是社会现代化最有价值的目标^[20]。“00后”大学生通过数字技术获得了比以往代际更高层次的“个人现代性”,并在技术赋权的优势下,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同社会环境的互动与联系,从而在寻求建构社会认同的同时,形成了与数字生活场域相适应的数字创造能力。换言之,“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并没有脱离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核心任务仍是要建构形成与特定年龄阶段和身心特点相适应的“自我同一性”。与以往不同的是,“00后”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建构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和制约,在建构内容和建构维度上都带有浓厚的数字化特征。本研究以“自我同一性”为中介解释机制,通过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初步探索厘定“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内在包含的结构维度和因子,即自我身份认同、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机器三重结构以及“数字化身份认同”“交往趋向”“网络群组”“边界意识”“网络适应”“技术依赖”六个因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调查结果和学界现有研究,分析了“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即在数字化自我认同方面表现出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流动整合;在数字化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出交往方式变化与社交圈层延展;在数字化人机互动方面表现出“积极适应数字技术发展和拒斥操控”。

“00后”大学生数字化发展的结构和特征启示我们,在数字化日趋成为学生生存发展基本样态的背景下,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学生“自我同一性”建构的积极作用,引导学生建构更具融合性的自我身份,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技术的关系。

第一,加强数字身份和现实身份的相互融合。数字化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线上线下流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也催生了多重“数字身份”。为此,要提高学生在线上身份和线下身份之间自主转换、有效衔接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优化线上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内在关联,引导他们在真实的物质空间和虚拟的数字空间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张力。同时,要调节因线上线下流动变化带来的认知冲突和价值失调,引导学生认识到多样的数字身份背后并非独立“自我”,而是其所体验的“角色”,进而逐步形成更加清晰、更加稳定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

第二,加强数字交往和现实交往的相互促进。数字空间无疑使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内容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和丰富,但是根据社会置换理论,过度使用网络社交媒体会占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社会互动时间,导致现实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降低,从而产生社交焦虑等一定的消极影响^[21]。同时,开放、多元的数字交往是一种弱连接,交往范围越大,关系的陌生感、疏离感和不信任感越强。基于此,要引导学生把现实交往作为构建良性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累积正向情感激励和交往体验。要规范学生数字交往行为,提升学生自身在数字空间健康交往、文明互动、理性表达的观念和素质,增强学生防范处理数字交往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有效预防和破解数字化交往可能带来的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窃取等问题。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更具人本性和实效性的人机关系。人机深度融合是数字化生存的基本特征。新型人机关系不再遵循原有的工具性思维,而是更加突出“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共同创造,要在关系思维中谋划更好的人机关系与人类未来”^[22]。由此,如何找准人机关系的融合点,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共处,是当前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要紧紧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健康发展,针对信息检索、学习推荐等问题,发挥数字技术的智能化优势,构建“以机器为主”的支持性人机关系;针对交互问答、情感激励等问题,发挥学生与技术的合作优势,构建“机器和人交互作用”的协同性人机关系;针对价值养成、情操陶冶等问题,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构建“以我为主”的引领性人机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谷贤林:《大学生发展理论》,载《比较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
- [2]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杜殿坤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 [3] 凯洛夫:《教育学》,陈侠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 [4] Maloni, M., Hiatt, M. S., Campbell, S.. Understanding the Work Values of Gen Z Business Studen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19, (3).
- [5] Managing Workers of the Next Decade, <https://www.onrec.com/news/news - archive/managing - workers - of - the - next - decade>
- [6] 伊莱恩·卡斯凯特:《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张森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 [7] Brown, P. 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Digital Identities, and the Digitized Self, Boston College, 2016, p.204.
- [8] 杰弗瑞·简森·阿内特:《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第五版)》,雷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 [9] Arnett, J. J..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Emergence of Emerging Adulthood: a Personal History, *Emerging Adulthood*, 2014, (3).
- [10] Schwartz, S. J., Côté, J. E., Arnett, J. J.. Identity and Agency in Emerging Adulthood: Two Developmental Routes in the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Youth and Society*, 2005, (2).
- [11][14] Seider, S., Gardner, H.. The Fragmented Generation, *Journal of College and Character*, 2009, (4).
- [12] Gergen, K. J.. The Self as Social Construct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2011, (1).
- [13] Côté, J. E.. Emerging Adulthood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Moratorium: Risks and Benefits to Identity Formation, *Emerging Adults in America: Coming of Age in the 21st Century*, 2006, pp.85 - 166.
- [15] 曲垠姣 杨峰:《青年融入网络群体的交往效能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16] Sales - Filho, G. S., Bandeira, I. D., Argollo, N., et al.. Hikikomori Syndrome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 Systematic Review,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 2023, (2).
- [17] Mahmud, M. M., Wong, S. F.. Digital Age: the Importance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mong the Undergraduates, *Frontiers in Education*, 2022, (1).
- [18] 陈丹引:《数字获得感:基于数字能力和数字使用的青年发展》,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
- [19] Dalton, J. C., Crosby, P. C.. Digital Identity: How Social Media are Influencing Stu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ollege, *Journal of College and Character*, 2013, (1).
- [20] 周怡:《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的新路径》,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10期。
- [21] 陈必忠 郑雪 孙晓军:《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线上社交焦虑:社交媒体认知超载和特质正念的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年第5期。
- [22] 周丽昀:《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关系转向”》,载《哲学分析》,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彦)